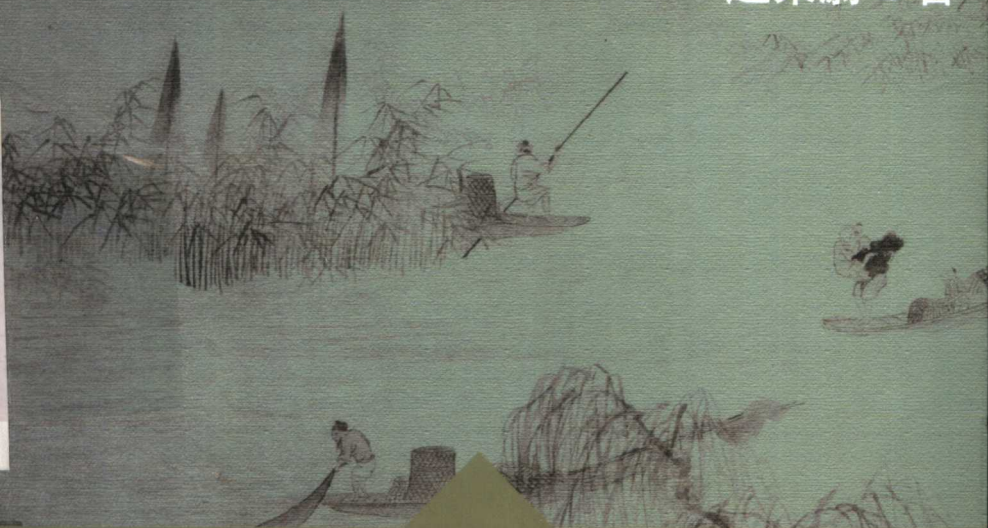




晚唐 士风与诗风

赵荣蔚◎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唐士风与诗风 / 赵荣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325—3898—2

I. 晚... II. 赵... III. ①士—研究—中国—唐代②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 2②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752 号

晚唐士风与诗风

赵荣蔚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388,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25—3898—2

I·1739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64063949

序

郁贤皓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唐诗嬗变发展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深入,硕果累累。但相对而言,对晚唐诗歌的研究,却是个薄弱环节,尚有许多问题需要发掘和考论。赵荣蔚博士的《晚唐士风与诗风》,正好弥补了前人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对唐诗某一阶段的群体诗风进行研究,始于程千帆先生的高足蒋寅1988年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当时我有幸作为该论文的评议人,在第一时间拜读了这篇大作,深受启发。该文将大历十才子作为一个城市诗人群体,与当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特有士人心态,使当时诗人创作的诗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诗风,这种研究方法使唐诗研究更加贴近历史实际,因而我对该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9年起我自己培养指导博士研究生,就鼓励几位博士生也使用这种方法。如张采民博士写《隋唐之际诗歌之演进》,即用此方法阐述隋唐之际诗风的嬗变;查屏球博士写《唐中期士风与诗风研究》,从安史之乱写到甘露之变,特别加强了士风的变化对诗风嬗变影响的研究,其中写大历时期的士风与诗风,突出了大历十才子与元王集团的关系,在蒋寅博士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尹楚彬博士写《唐末诗人群体研究》以及赵荣蔚博士写《晚唐士风与诗风》,也都是沿用这种研究方法。如果将上述四篇博士论文串联起来,实际上就是一部完整的《隋唐五代诗歌

发展史》。这是我在培养博士生过程中有意识做的一项工作。

赵荣蔚君原是山东大学霍旭东和陈新先生的硕士生，毕业后到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1997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随我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荣蔚君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每门学位课程成绩都为优良，并按时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这对一个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荣蔚君将学位论文不断地修改补充完善，现在终于杀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此我深感欣慰。

现在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就是荣蔚君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共分五章，分别从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寒士心态，山水审美，诗人个性与诗风特征等角度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从诗人心态入手，重点考察了甘露之变前后至黄巢起义前近50年间的士风与诗风的关系，及其发展脉络和嬗变过程。其间通过对晚唐诗人的群体研究，揭示囊括在诗歌创作现象中的文化底蕴，探讨各个特定阶段士风与诗风相互影响的轨迹。因此，它既是一部翔实的晚唐诗风的演变史，也是一部晚唐士人的心灵变化史。

一部著作或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看其提供了多少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有创造性和发明。本书的主要成就，正是作者提出了不少前人未发的新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前人对令狐楚在元和后期编的《御览诗》和姚合在开成年间编的《极玄集》这两部唐人选唐诗都没有足够的重视，荣蔚君则结合中晚唐之交的社会政治背景，深入研究了其中所选的诗篇，通过两集的比较研究，详细描述了宪宗元和后期至文宗开成时期士风的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御览诗》的风格以轻艳为主，题材多为感兴、艳情、边塞、赠别；而《极玄集》有三大特点，即景物描写细致入神，浓烈的苦闷伤感情绪，追求闲适之趣。

由此得出结论：“从《御览诗》到《极玄集》，中晚唐之际的诗歌经过了从尚艳到崇雅的历程，它们所体现的不同风格特征和审美追求，成为唐诗发展史上士风与诗风转变的两大鲜明坐标”。这是作者在深入研究此一时期社会政治情况、诗人心态、两个选本中诗歌反映的思想特点后得出的具有创造性价值的结论。

荣蔚君还通过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东都闲适诗人群后期创作心态的剖析，揭示了甘露之变前后上层士人心路的曲折变化轨迹。如认为白居易后期的闲适之作，是在远离现实政治斗争，对时势悲观绝望后，崇老庄、佞佛禅、恋世俗的结果。认为在此期间的诗歌，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无法与前期相比，但是，在唐代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它们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即真实地反映了晚唐黑暗环境对士人心灵的极大摧残，透现出士人由积极入世、勇敢抗争到消极避世、妥协退让的痛苦心路历程。在东都闲适诗人的作品中，平凡掩盖了崇高，实用取代了理想，冷淡淹没了热情。这正是甘露之变后，政治愈益恐怖，危机愈益加深，士大夫阶层放弃社会责任感，对王朝向心力明显消退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从而为把握晚唐诗歌的政治品格和文化精神，全面、客观地评价白居易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提供了参照。这些崭新的阐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二、荣蔚君对晚唐苦吟诗人群的形成和诗风特征，进行了深入钻研和具体阐发，提出了许多与前人不同的新见解，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书中通过史料、传记的细致梳理和广泛征引，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揭示了晚唐黑暗科场对苦吟寒士心灵的戕害和精神的摧抑，指出：“黑暗科场是造成苦吟寒士胸襟气度狭隘和思想感情平庸的直接根源，并由此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它是苦吟寒士虽穷精竭虑、力疲神劳地致力于诗歌创作，但终究难以企及盛唐诗人的一个根本原因。”必须指出，前人谈“苦吟诗人”，多以孟郊、贾岛为主，而荣蔚君则详

尽地论述了从孟郊、贾岛到姚合以及晚唐苦吟诗人的精神内蕴的变化及艺术流变,并重点对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晚唐苦吟诗人领袖姚合,从时代环境、身世际遇、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最终得出“姚合上承王维及大历诗人,融汇张籍、贾岛等诸家之长,成为苦吟诗人的集大成者”的结论。认为姚合所提出的“六义”和骚雅并存的主张,淡化了诗中“不平则鸣”的愤激情绪,正符合上层统治者对诗歌创作的要求。他所追求和提倡的“清峭”诗风,不仅代表了苦吟诗人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且具有具体的操作规范和程式。这正是苦吟诗人群虽然同时学习贾岛和姚合的苦吟态度,但在艺术旨趣上最终远离贾岛,选择姚合,形成情感平和、风格雅正创作格局的最深层的原因。荣蔚君强调指出:“姚合作为苦吟诗人的领袖和代表,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起着一种示范作用。”

荣蔚君还分别从衰微时代的悲歌、失意人生的咏叹、真挚友情的倾诉及诗心禅思的感悟等四个方面,对苦吟诗人的诗歌内容进行了评析,认为:“苦吟诗人没有高尚的理想,缺少充沛的激情,缺乏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他们躲在自我天地里从事文学创作,成就不高,内蕴不深。”这是晚唐寒士的典型音调。但却“真实地表现了下层寒士的生活、思想、心态和情感历程”。与东都闲适诗人群的创作相比,苦吟诗人的作品更加接近平凡、衰微的人生,更能真实地展示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及精神世界。关于苦吟诗人的艺术追求,荣蔚君概括为“清新峭拔、雅洁明丽”的总体特征,并分别从情感的雅正平和、诗境的冷峭清幽、思致的新颖精巧和语言的刻削烹炼等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苦吟诗人艺术追求的特点。指出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造成苦吟诗人眼界的狭小,由于才短气弱,缺少卓然屹立、开宗立派的魄力,因此,他们只得在王、孟和大历诗人平淡清空的诗境传统中,经营意象,锤炼语言,力求变化出新,以避前人蹊径。他们注

目于周围常常被人忽视的、而与自己的情绪颇为协调的琐屑之物、荒寒之景,经过自己内心的艺术过滤,配以一种生活情调,创造理想的诗境”。同时还指出,苦吟诗人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机械摹仿姚合,他们在艺术上各有追求:顾非熊的清永,喻鬼的清秀,刘得仁的清莹,周贺的清奥,马戴的清拔,李频的清严,方干的清润,刘威的清弱,任翻的清婉,皆能各标一帜,自成一派之风。认为“他们虽然缺乏韩愈、孟郊出奇制胜,戛戛独造的才力和成就,但也能在自己各自的创作实践中尽其所能,苦苦探求,显示了不甘平庸,求新求变的强烈而普遍的自觉,共同为晚唐诗歌,尤其是五律艺术的完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所有这些对晚唐苦吟诗派的论述,显然都是作者独到的创见。

荣蔚君采用具体意象分析统计的方法,统计出姚合、马戴、周贺、郑巢、刘得仁、喻鬼、姚鹄、方干、李频等人诗中都有十个至数十个用“寒”字组成的词组,指出苦吟诗人为了追求诗境的冷峭清幽,在用词上大量使用“寒”字,增强触觉意象,借此加重诗境的峭冷,真可谓力透纸背,满目生寒。此外,苦吟诗人还爱用“钟声”这一听觉意象,烘托映衬,使诗境更加空灵清旷。统计姚合、刘得仁、喻鬼、马戴、周贺、方干、姚鹄、顾非熊、郑巢九人共用“钟声”66次。在各苦吟诗人笔下,钟声也展现着不同的品格,有残钟、孤钟、疏钟、寒钟、晓钟、曙钟、晨钟、暮钟、夜钟、深钟、霜钟、秋钟、寺钟、山钟、乱钟、虚钟、远钟、铁钟、余钟等等。他们还在诗中通过大量僧禅题材的描写,用“僧禅”和“空”字来使诗歌具有脱俗气息,增加诗意的超拔感。姚合、刘得仁、马戴、周贺等四人此类作品共有139首,用“空”字共81次。这种用统计数字来说明苦吟诗特点的做法,也颇具新意和说服力。

三、荣蔚君对许浑、刘沧、张祜、赵嘏为代表的晚唐格律诗人群的创作进行了探讨。认为从许浑、刘沧,到张祜、赵嘏,“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是其共同的心理机制和行为特征。身处

晚唐动荡纷扰之时世，士人仕固不易，隐亦艰难。因为隐居若无“入山之资”，则不免饥寒之苦。所以即使是卑官微禄，诗人们也不能放弃。险恶的宦海风波磨掉了他们早年的棱角和锋芒，兼济天下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击碎。他们情系魏阙名利，心思沧州逍遥。当科场惨败、彷徨无助时，或仕途挣扎、疲惫不堪时，田园的宁静、山川的悠远，自然成了他们心所向往的对象。这便有了仕隐互补。但相对来说，总是仕为主，隐为补，仕是执着的、长久的追求，而隐则是暂时的、无奈的，是一种释散郁闷、排遣忧愁的方式。荣蔚君指出，解读他们的忧国忧民、清高雅洁的作品，以及那些干求卿相、弋取货利的诗章时，我们会因此体谅他们在仕隐出处问题上表现出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其人格价值的多重性和多变性。毕竟那些格调卑下的作品，在真实反映晚唐坎坷不遇的下层士人的内心世界方面，仍然具有认识价值。

在论述格律诗人群山水诗的总体风格时，荣蔚君详细辨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指出许浑的山水诗多写于送别友朋时，“每每能摄取自然风物的神韵，以画家的敏感、诗人的慧心，再现那极富生机和野趣的景观，将‘烟云风鸟之思，揉弄亦已尽态’”。刘沧的山水诗“多写于匆匆的羁旅之途，通过山川景物的描绘，反映游宦之中的旅途苦辛及乡关之思，较多地染上了寒士的悲凉情感”。赵嘏的山水诗多作于留滞长安期间，“在对故乡山阳秋夜月雁、春风杨柳的优美风景及自己在田园悠闲自得生活的深情怀念中，时露哀伤之情”。而“张祜一生流浪江湖，辗转依人，落拓失意。世无知己，无人提携的痛苦，促使他投入大自然宁静的怀抱，从中寻找寄托，寻求安慰。他把满腹的哀怨诉之于山水，创作了不少反映羁旅行役的优秀诗篇”。对于他们的总体特征，归纳为“清迥苍凉，工稳浏亮”。这些论述，亦多出自己见，不乏创造性。

第四,荣蔚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三大家诗歌的历史文化色彩作了进一步的开掘。如对杜牧一生沉浮与牛李党争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是对会昌年间出刺黄州的原因,通过史料考证和杜牧自己诗文的印证,认为杜牧此次离京,并非出于李德裕的排挤,“主要原因正是他此前得罪李绅所致”。指出杜牧一生中得意一时,沉沦半世。尽管他具有经邦济世的才干,忧国忧民的思想,苦苦追寻施展抱负,但在文、武、宣三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一直未遇风云际会的良机。特有的英雄主义性格及其独特的人生遭遇,使杜牧的理想总是与现实世界抵牾。在晚唐政治舞台上,他被无情的命运逼迫重演着贾谊的悲剧角色。巨大的角色反差,使他激愤不平,强烈的伤痛伴随了他的一生。

荣蔚君认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三人都深染当时进士阶层的“浮薄”之气和躁进之心,他们磊落的品性在牛李党争中左右为难,失意不偶。感时愤世,不能自己。但不同的性格和身世、经历使他们的诗风有着明显的差异。荣蔚君指出,杜牧学杜、韩,善将其雄姿英发融于薄物小篇,于俊爽拗峭中见出风神韵致;商隐师承广泛,深于寄托比兴,善以心象融铸物象,深情绵邈,沉博绝丽;庭筠擅长乐府,取法李贺,道劲清丽,蕴藉迷离。他们的律诗学王、孟、杜甫,托物兴寄,沉郁苍凉。他们的创作代表了晚唐诗歌的最高成就。这些论述,比较平实,但亦可见荣蔚君的独立思考。

最后,荣蔚君对懿、僖之际尚俗寒士诗人群的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提出皮日休是唐代继王通、韩愈之后又一个以张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挽救颓败国势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多注重其小品文对晚唐社会弊端深刻犀利的揭露和批判,而对其尊儒重道的思想则以“空言明道”、迂腐不切实际而加以否定。其实这些论断缺乏客观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忽视

了其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和合理性。荣蔚君结合晚唐具体历史现实,通过对其尊儒重道思想的分析,探讨了其积极意义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认为皮日休在晚唐国势衰败、危机重重之时,倡扬尊儒重道,强调经世致用,力主改革现实,企图以此来挽救世道人心。他大胆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说,通达时变,兼容诸家。他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对理想王道政治的汲汲宣扬和向往,体现了乱世之秋儒者的兼济情怀。这一观点显然具有创新意义。

荣蔚君阐述了唐末尚俗寒士久困科场,有志难伸,内心倍受压抑,强烈的仕进欲望与黑暗环境的激烈冲突,使他们狷介褊狭的个性显得更加突出:如皮日休的“傲诞”,陆龟蒙的“狷急”,聂夷中的“自嫌性如石,不达荣辱理”,曹鄴的“自觉心貌古,兼合古人情”,刘驾的“我爱抱苦节”,“立身无苟且”;罗隐的“性傲睨”,“恃才忽睨,众颇憎忌”,杜荀鹤的“恃势侮慢缙绅……众怒欲杀之”,李山甫的“满腔怨毒”,“生憎俗子”,“不得众情,以陵傲之”,无一不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行为表露。荣蔚君认为胡震亨指出的“咸通而后,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气萎语偷,声繁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者有之。王化习俗,上下交丧,而心声随焉,岂独士子罪哉”所言极是。此期世风、士风与诗风的变化,导致传统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变异,从乐府古风诗人的指陈时弊,到格律诗人的怨愤刺讥,大中至咸、乾之际的寒士诗歌,一方面继承了元白新乐府哀伤民瘼,反映现实的浅俗传统,一方面逐渐消泯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功利目的,更多地融入个人的激愤不平之情,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怨刺色彩。荣蔚君还特别指出,格律诗人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生活的时代稍晚,已入唐末五代,他们锐意功名而潦倒不堪,在黄巢起义和军阀混战中,漂泊流离,饱经忧患,其诗歌更多地描绘了唐末动荡离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诗人的忧国伤时之

心。荣蔚君用“末世醒语，冷峭尖刻”来概括唐末五代的诗风特点，也表现出作者对这一时期诗歌认识的独创性。

总之，荣蔚君的这部著作力求用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深入地来阐述晚唐各个阶段各个群体的士风与诗风及其嬗变，是完全达到了既定目标的。如果说还有不足之处，可能有些问题尚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文字表达尚可更简洁些，今后如有机会，可适当作些修饰。这只是小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学术价值。

值此著作出版之际，略陈鄙见，聊以为序。

二〇〇四年九月八日写于金陵寓所

绪 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唐代诗歌以丰蕴深厚的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吸引着古往今来的无数研究者。千余年来,著述如林,佳构迭出,硕果累累。然而,人们也看到,在唐代诗歌的研究中,晚唐诗歌的研究至今仍然显得十分薄弱。一方面,与初、盛、中唐诗歌相比,晚唐诗歌总体上显得精神卑微、气局狭小、品格柔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以文学成就之高下、作品内蕴之深厚,作为判断研究价值的砝码,以致在晚唐诗歌研究这一领域中,除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韦庄等少数几个名家外,绝大多数诗人还一直被人们所轻视和冷落。

新时期以来,随着新的哲学思潮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和浸润,研究者们开始转换他们的学术思维。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思想价值、文学观念和研究思路的变化,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也大大拓宽。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已经呈现出的具体文学现象的重复解释,不再满足于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名家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反复阐说。唐诗的研究逐渐抛弃了简单的价值评判,愈益趋向于理解性的客观阐释,对作家排座次、贴标签的简单片面做法从此成为过去。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式的更新,带来了晚唐诗歌研究的新局面。

晚唐诗歌研究在新时期的最大成果,首先是学者们大胆突破了“初盛中晚”这一对唐诗发展时段划分的传统框架,从“四唐说”中,将“唐末”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晚唐中“别裁”出

来,作为唐代诗歌发展史的一个独立单元。早在1986年,罗宗强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①中,就已经把晚唐文学思想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其中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末为晚唐前期,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为晚唐后期。罗先生在书中详尽论述了咸通前后士人心态的变化及文学思想的差异,认为“晚唐前期士人也关心朝政,也有抱负,但被现实的失望压抑着,内心充满矛盾;晚唐后期则大多已失去对于朝廷的任何希望,或则采取了一种愤慨抨击的态度,或则避世以自全。反映到文学思想上,便是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影响的消退。”罗先生的划分得到了许多唐诗研究者的认同:许总的《唐诗史》^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③中,都沿袭了这一思路,即以咸通元年(860)为界,把晚唐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九十年代之后,定位于唐末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开始出现,其中力作当数余恕诚先生的《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④,此外,景凯旋的《孟贾异同论——兼论中晚唐诗歌的分期》^⑤、康萍的《唐末诗歌中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⑥及《浅谈唐末诗歌对五代宋词的影响》^⑦、臧清的《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⑧均在唐末诗歌的综合研究上多有创获。

1997年,南师大尹楚彬的博士论文《唐末诗人群体研究》、北师大刘宁的博士论文《唐末五代诗歌研究》可说是关于唐末文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前者考论结合,分析综合出咸通以后有多个诗人群体,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各群体的人员和诗歌进行考辨研究,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后者则以咸通以后的诗歌风貌为中心,从唐末文学的群体、唐末诗体、唐末文学与宋初文学的关系等方面,对唐末文学现象做了多方面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位研究者不再是从正统“文学”观

念出发去发现问题,他们的出发点也不再是要竭力揭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就,而是以敏锐的眼光,注目于考察唐末作为唐诗向宋诗过渡的中介环节这一特殊的位置,以“史”为纲,研究的命题是这一时段在文学转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尹楚彬认为:“皮陆诗派在唐宋诗史上的地位,主要还在于吴中唱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娱文学观和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倾向。”因而,“在从杜、韩的‘以文为诗’到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演变过程中,皮陆诗派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刘宁也指出,如果说“大和以至大中年间的诗艺与元和艺术新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以往被视为唐诗尾声的咸通以后的诗艺,则体现出反拨元和的趋势,调整的方向成为宋诗的开端”。他们都从唐末这一唐宋转折最关键之处切入,故得出的结论在许多方面都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晚唐诗文集 130 家,其中较著名者 10 余家,可谓作家众多,作品繁富。在具体的研究对象方面,就目前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和有关研究论著来看,晚唐诗歌的研究已涉及到作家生平考订与作品编年、社会文化历史背景考察、诗歌类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诗歌“转型”、“过渡”之特性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并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信服成果。

在晚唐诗歌的研究中,对作家史料的整理研究,其成就始终远远超过“文学”的研究。尽管晚唐二、三流诗人居多,史料并不匮乏,但与初盛中唐相比,作家作品考订的难度实际上却大大超过前者。晚唐武宗以后实录缺佚,野史私乘虽众而多有错讹,真伪混杂,互相矛盾。作家之间的事迹材料又彼此纠缠,难以理清头绪,这就给考证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然而,研究者们知难而上,爬梳整理,考证辨析,兀兀穷年,探幽抉微,其中吴在庆、陶敏、陈尚君、胡可先等学者在晚唐文人生平资料的考证方面成绩斐然。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①中的三、四、五册正

是对晚唐文人生平考订重要研究实绩的集中展现。吴在庆先生的《唐五代文史丛考》^①也是具有示范意义的考证力作,全书分为名字考,生卒年考,籍贯考,登科年考,生平仕历考,诗文题目、作者及失收诗文辨补,诗文人姓名及作年考辨等七个部分。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是考订晚唐五代作家作品的。作者对史籍记载的错讹阙漏、歧异龃龉之处,细心辨正考索,论定择取。在旁搜博考、缜密推敲的基础上,弄清了晚唐许多作家的生平仕历及诗文作年等详情,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经过审慎研究过的可靠的相关资料。吴汝煜、胡可先先生的《全唐诗人考》^②以及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考证》^③是两部性质相近而各有特色的人物考证著作,前者重在总结已有的成果,以平实见长;后者尤以力破陈说,独创新见而引人注目。此外,一些往往为人忽视的作家的生平考证也有不少论文发表,如曹唐、曹邺、杜荀鹤、贯休、方干、胡曾、李群玉、李远、刘驾、雍陶、陈陶、唐彦谦、郑谷等。

这些基本的作家生平考证,为晚唐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学者们意识到,如果不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放在整个文学发展的综合环境中加以全面系统的辨析,就很难从单个作家的生平材料中发现重要的文学史命题,而傅璇琮、吴在庆先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五代卷》^④正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对晚唐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中,学者们摆脱了传统反映论的制约,不用大而无当的帽子,力图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努力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内化在文学研究的具体内容中,进而发掘社会文化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吴在庆先生的《中晚唐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⑤、许总先生的《论唐末的社会心理与诗风走向》^⑥以及林继中先生的《论唐宋诗的整合》^⑦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样的研究,使人们感到对唐末政治背景的理解再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落在了实际。

在晚唐诗歌类型的研究中,至今已涉及咏史诗、咏物诗、山

水诗、七言律诗以及绝句等多种类型，而咏史怀古诗一直是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晚唐的咏史怀古诗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一些重要诗人如杜牧、李商隐、许浑等都写过不少著名的作品。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大致不出作家之间的横向比较和对咏史怀古诗风格与成因的探讨两个方面，而得出的结论也都基本近似：晚唐衰微的国势往往被看作是诗人选择咏史怀古诗的最直接的理由，而咏史怀古诗往往又被认为是诗人借古讽今的一种常见手段。这样的解释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历史上每次朝代变更时衰微国势的普遍性，又如何能够解释咏史怀古诗在晚唐繁兴的特殊性？为什么在其他朝代变更时却没有出现如晚唐咏史怀古诗的繁荣情况？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学者们至今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结论。

在对晚唐作家群体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一是对唐末诗人小团体的研究。如周勋初先生的《“芳林十哲”考》^①，《咸通十哲之论》^②；尹楚彬的博士论文《唐末诗人群体研究》把唐末诗人分为六大群体，详细考辨了诗人群体的组合情况及其创作特征。二是从宏观上对晚唐诗人群体进行把握研究。如余恕诚先生《唐诗风貌》^③一书中第六章《晚唐绮艳诗歌与穷士诗歌》，将晚唐诗人分为两种类型，即两大诗人群体：一是以温庭筠、李商隐和杜牧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一是后继张籍、贾岛、姚合的一大批“穷士”诗人群体；刘宁在《唐末五代诗歌研究》中，则把唐末五代诗人分为“寒素诗人”、“贵胄诗人”与“方外诗人”三个群体。

总的说来，晚唐诗歌的研究已经在一些具体问题、具体作家身上取得了相当成果，但在对晚唐诗歌的整体研究把握上，至今还停留在现象、流变的一般性描述，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在论及此期诗风特征时，大多以浅陋目之；对其生成原因，简单归之于社会黑暗动荡，以致于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典型例子。这

当中,对晚唐诗人的群体研究,尤其是士风与诗风的内在联系和流转移变,人们往往不够关注。本书正是要致力填补、充实这一缺失。

晚唐诗歌是唐代诗歌的辉煌总结,它不仅是唐诗向宋诗过渡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生突变的转折点。对晚唐士风与诗风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真正把握晚唐诗风特征成因之关键,理清唐诗整体嬗变与阶段演进的各个脉络,更好地领会晚唐诗歌的精神内蕴,而且对于更深入地考察宋诗对唐诗的传承因革,准确认识晚唐诗歌的历史价值及其在唐代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书以晚唐士人的生存方式、凄凉心态以及功名观念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甘露之变前后至黄巢起义前,近五十年间唐代士风与诗风的关系,及其发展衍变历程,探讨各个时期士风对诗风变化的具体影响。在对各阶段诗人群体的构成及其诗风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晚唐诗歌发展的清晰轨迹及其诗风流变的文化底蕴。

本书的写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基本原则,在充分占有原始材料的前提下,立足于诗歌文本,运用归纳比较的方法,逐层次地展开对晚唐士风与诗风的分析研究。作者注意充分吸取学者们的考证成果,对晚唐诗人与作品的传记、评论材料,也尽可能搜集完备,并经过认真的审查辨析,作为研究的依据和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则择善而从,凡所征引,均一一注明,以不掠人之美。参考书籍尽量使用新出版的精校注标点本,无新版者则用通行版本。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